

• 2050 中国新工业化论坛(16) •

# 2050 中国新工业化全球合作发展战略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院新工业化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本报告主要研究和阐述2050中国新工业化全球合作发展战略的基本理论、战略任务和战略举措。

2050中国新工业化全球合作发展战略的目的是团结全球各国共同推进新工业化进程,促使全球人类进入一个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在新工业化全球合作发展中,中国理应发挥较大作用,成为全球新工业化进程的引领力量。

## 一、新工业化:全球化的新时代

中国崛起在工业危机和新工业革命中。新工业时代是人类建成全球化文明的时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将在新工业革命中被突破,人类将实现空前的统一。显然,中国崛起已决不再是自己一个国家的事情,中国需在谋求全球一体化整合中实现伟大复兴。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这也是突破民族主义走向全球主义的一场大革命。没有这场全球化视野的大革命,中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人类是从群体性极其突出的古猿群演变而来的,社会性——高级的群体性成为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的社会组合形态及规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各个方面。人类的社会组合像一切物质组合的发展趋势一样,最终都是实现高度的有机化、整体化。从总的趋势上看,人类的社会组合是逐步由小变大、由松散变紧密,最终形成全球人类一体化的社会。

工业时代形成的国际化社会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所以,工业时代的国际政治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占据强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强加于国际社会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强势民族主义政治。当工业危机来临时,全球社会中的民族主义的政治体制也开始发生危机,例如全球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金融危机、文化冲突等都导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社会体制危机,亟需全球化的社会体制和机制来解决。所以,新工业革命在国际社会体制上带来了全球一体化的大革命,全球人类开始步入真正高度整合化的新时代。

目前,随着工业化在全球范围的推进,许多时代难题,如人口急剧增长、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步加重起来,促成了工业生产方式的危机。这些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局部的社会问题或特定国家的问题,而是形成了全球性问题。在今天,印度的人口问题不再局限于印度自身,而是给全球带来了人口危机;中国的环境污染也不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成为全球污染的大问题;中国、印度的工业化发展中的资源匮乏也不再是它们自身的资源匮乏,而是全球性的资源短缺和争夺。这个事实表明,工业化生产力已经具有全球性规模,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在今天,工业化带来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物了,而是全球性问题,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了积极应对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新工业革命已经在全球范围兴起。工业革命曾首先在一个国家——英国兴起,而新工业革命则在全球范围兴起。现在,谁能说清新能源革命是在哪个国家发生,循环经济是在哪个国家形成?我们只能说哪个国家在哪个领域的新工业革命走在前列,而且这种前列位置是不断转换的。尤其是随着科技、产业的全球化转移速度的加快,现在哪个国家也不可能长期占据科技、产业的霸权地位,更不可能永远封闭全球性交流。过去,工业化的全球蔓延经历了几百年,时至今日工业化也未在全球实现,但新工业化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成果在几年时间里传播到全世界(当然不是在全世界马上普遍实现)。所以,新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新产业革命。面对这样的革命,我们再也不应该闭门锁国拒绝学习和交流,而应该积极参与合作。显然,那些以种种借口拒绝科技、产业、经济甚至政治交流和合作的行为都是逆世界进步潮流而动的落后行为。

随着工业危机的出现和新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物质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新的革命,人类的社会组合也进入了新的飞跃时期。目前,全球性科技、产业、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全球性合作机制逐步完善,全球性组织更是不断涌现。这都表明全球人类的组织性更加紧密了,全球一体化社会正在形成。

1.全球循环经济体制。为了应对资源短缺尤其是环境污染形成的危机,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正在众多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形成,这就是循环经济体制。造成资源匮乏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生产的“自然资源→产品→废物”的单向生产模式。显然,克服资源匮乏与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就是改变工业生产的单向生

产模式,使其转变为“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生产新模式。在这个循环生产过程中,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废弃物都可经过再生资源环节而进入再生产。由于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提高了资源使用率从而部分地缓解了资源匮乏。同时,由于作为污染源的各种废弃物不断进入再循环利用,这就克服了把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去造成污染的问题。目前,世界广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在这方面,日本、德国等国家走在了前面。例如,日本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步伐扎实,独树一帜。日本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环境ISO14000”认证的企业总数,多年来一直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以大型企业为主的一批“零排放工厂”已经建成,许多企业还编制了“绿色采购”标准书。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生产国。这是因为,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对资源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而许多发达国家为了避免处理废弃物的成本过高而把它们转移到中国,于是中国就成了废钢铁、废纸张、废木材、废电器等废弃物的进口国,肩负起世界性的循环生产的重任,极大地减少了全球环境污染。目前,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循环经济体制正在形成。

2.全球环保体制。一是建立起一大批世界性的环保组织,使原本少数人的环保行为成为大多数人的有组织的活动,有的国家甚至把环保活动转变为政治行为。例如,在德国就建立了绿党组织甚至参与执政。二是形成了越来越规范的环保机制,甚至使之成为正规的经济机制,如全球性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就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减排。德国甚至把对外援助也环保化,把对外援助资金列入到环保项目,把提高受援国的环保水平视为全球性环保行动。显然,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新工业革命行为。现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纷纷把环境保护视为义不容辞的义务。尤其是在一些事关全球整体利益的环保大领域里,全球化的环保机制更加健全。例如,为了应对全球变暖,联合国组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定期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减缓进行评估,不断提交出重要的报告供各国政府制订政策作依据,这也极大地提高了全球人民的环保意识。再如巴黎气候协议的签订,更是提高了全球人民的共同环保意识和行动。

3.全球资源合作体制。工业化所需的矿物资源是有限的,面对有限资源必然形成激烈争夺,这正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局限和危机的表现。但新工业革命的兴起带来了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的广阔天地,这个新天地正等待人类的全球化资源合作。例如,石油、煤炭、天然气的开发利用都是排他性的,由于资源有限国家之间争得你死我活。但是,风能、太阳能、核聚变能、太空能源都不具有排他性,既可由各国自己开发,又需要合作开发利用。目前,在核聚变的研究开发中世界主要大国就走在了一起,共同承担这份可以彻底解决全球能源匮乏的重任。在太空开发中,许多大国也走在了一起,中国还和许多中小国家建立了太空研发合作机制。再如,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的研究和产业开发也一直在国际合作中进行着。所以,发生争夺的是工业化资源,而新工业化资源则需要全球合作来开发。显然,新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具有更大的全球亲和力。

4.全球经济一体化体制。在新工业革命中,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过去那种“资源国——生产国”和“资源国——加工国——消费国”的区分越来越模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交流,产业的快速转移,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国际合作的加强,世界的发展会逐步趋于平衡。目前,全球经济区域化发展十分突出,北美、欧盟、东亚、亚太、南美、非洲等众多区域经济在崛起,合作的区域越来越大,合作的深度越来越深。世界经济已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地,今后不会再有绝对的赢家,而只有全球共赢或全球共输。例如,当前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以及全球化的应对举措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5.国际软实力交往体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加深,全球资源合作体制、全球环保体制的建立,国家之间的交往不再以硬实力为主,文化的软实力则日益突出,于是国际软实力交往体制应运而生。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曾经支配世界几百年,欧洲自古以来就一直在战火中洗礼,尤其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血雨腥风,曾使人呼喊出“西方的没落”的哀鸣。但二战之后,欧洲发生了谁也未敢设想的变革,逐步走向了和平和统一。欧盟各国建立起一种软实力交往和组合体制,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以一种巨大的亲和力凝聚着新欧洲。现在谁也无法再想象欧洲会走向战争。究其实质,这是文明的整合力,而这文明不再是工业化的传统硬实力,而是新工业化的

软实力。全球范围的整合,更必须依赖新工业化的软实力。

6.全球政治协商体制。联合国的作用日益提高,国家之间和多国之间的政治对话体制日益健全。这种不再诉诸武力而是基于对话的体制就是全球政治协商体制,它更为有效地协调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朝核问题的多国磋商、伊朗核问题的多国协调,都是政治协商体制的积极成果。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问题纳入全球政治协商体制中加以解决。表面看这似乎与新工业革命没有什么关系,实则不然,这都是工业危机和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新变革,紧密的全球科技、产业、经济、文化关联促使政治关系也发生了软化转变,新工业革命更展现了全人类广阔的前程,突破了目光短浅的你死我活的旧政治体制。仅仅依靠军事实力而争霸世界的时代即将过去。

新工业革命还只是突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走向全球主义的过程,当新工业化完全实现时人类就将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社会,这也就是人类的全球化文明。由此可见,采猎时代是氏族部落社会,农业时代是乡村城邦社会,工业时代是民族国家社会,新工业时代则是全球化社会。

## 二、反全球化:强势狭隘的民族主义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30多年,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推动了全球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中获得史无前例的进步,成为当今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受益者和引领者。

然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逐渐兴起。2017年是在一连串疑问中开始的:英国公投选择退出已经待了43年的欧盟,作为昔日经济一体化标杆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欧洲反建制、反精英、反移民情绪日益接近主流;曾经的经济全球化推手美国,在新一届总统选举中喊出了“美国(利益)第一”的一系列反全球化口号和政策;跨境贸易与投资持续低迷,贸易壁垒逐步筑高,区域一体化进程横生波折;种种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迹象频繁显现。

这种反全球化的逆流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必将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反全球化潮流是暂时的,从实质上讲它是工业化局限性的产物,这突出地表现为它归根结底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工业化高潮时期,这些获得发展先机的国家对世界落后国家实行霸权主义,推行强势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一种暂时的全球化推动力。当工业危机来临时,这些发达国家受到了新兴国家的冲击,它又想起关门来拒绝新兴国家经济浪潮的冲击。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上任就提出要和中国谈判,谈什么?归根结底就是向中国要市场、对中国关大门。

为什么说目前的反全球化思潮缘起于强势狭隘的民族主义呢?

西方国家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支配统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强势狭隘民族主义政治,或者说是一种强权政治。所谓“强权政治”,指的是强国凭借经济军事实力向外扩张,力图建立由强国操纵的国际体系,以谋求霸权。在强权政治中,推行的是“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的霸权主义原则,把大多数弱小国家排斥在国际政治之外。西方列强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所遵循的“强权即是公理”的霸权主义原则,是1862年9月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在国会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的。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弱肉强食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这种强权政治的具体体现。

我们把西方国家的这种强权政治称之为强势狭隘民族主义,原因在于它是奉行本民族本国家利益至上而压迫剥削的民族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在工业时代以前,社会政治如战争主要发生在国内,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社会政治日益提升到国际层面,如战争主要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西方国家成为全球工业化的强势力量,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强权政治,成为世界范围内民族和国家关系的支配力量。所以,我们说西方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强势狭隘民族主义政治。这种强势狭隘民族主义政治具体表现为多种形式。

殖民主义是西方强势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在工业化过程中,西方国家采取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占领、奴役和剥削弱小民族和国家,将其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时期,殖民主义的表现也不同。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强国主要采取暴力手段,以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盜式

掠夺、欺压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方式来欺压弱小民族和国家。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强国则利用国际贸易的方式把欠发达民族和国家变成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廉价劳动力来源地。在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强国进一步把资本输出变成剥削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主要手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的统治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国家的强烈反抗下,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最终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被彻底摧毁。但是,西方强国并未有完全放弃其殖民主义政策,而是采用了隐蔽而更具欺骗性的手段继续维护和谋求殖民利益。

霸权主义是西方强势狭隘民族主义的又一主要形式。霸权主义一词源于古希腊,指的是大城邦对其他城邦的控制,现在演变为某些国家凭借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干涉、控制他国的主权,谋求主宰世界或地区事务的权利。近代霸权主义始于“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这也是工业化的孕育和兴起时期。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向外扩张的国家,它最先开始了对非洲的掠夺。后来,西班牙几乎囊括了中南美洲的开发。接着是荷兰、英国、法国开始了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掠夺。西方国家在将近500年的历史里,成为世界的支配力量,欧洲成为世界中心达400年之久。欧洲依仗在工业化进程中先行获得的优势,不断向落后国家和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倾销自己的商品,掠夺贫弱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在近代史上,充满了西方列强劣迹斑斑的霸权主义争夺,参与这场持久的霸权主义争夺的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沙皇俄国以及日本、美国。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西方强国争夺世界霸权而导致的人类史上空前残酷的大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空前增强,成为超级大国,向世界各地扩张以寻求自身的全球利益,走上了世界霸权的顶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60年代发动了越南战争,80年代出兵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90年代又发动了海湾战争和参与了前南斯拉夫战争。21世纪初,“9·11”事件促使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战争本质上都是美国谋求全球利益而发动的战争,在战争背后无不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目的。美国无时无刻不把“美国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却对别的民族和国家的人民的生死存亡置若罔闻。事实证明,当年布什政府信奉“美国新世纪计划”,用它来回应“9·11”事件,主要就是为了实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这个计划在伊拉克战场上惨遭失败,虽然没有彻底消除西方中心的全球帝国得以实现的机会,但大大降低了这种可能性。

西方强势狭隘民族主义充满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它是工业化国际化的产物,具有走出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特点。另一方面,它依然存在着不可磨灭的狭隘民族主义本性,处处表现了民族和国家的局限性。

客观上看,西方强权政治对于世界工业化进程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西方列强对贫弱落后的国家的突破促使工业文明得到了较快的扩展。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个十分残酷的过程,因为它充满了掠夺、蹂躏和杀戮。

尽管西方强势狭隘民族主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可抹煞。第一,西方强势狭隘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社会的全球化发展具有着内在的对抗性。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但这是在有利于本国资本扩张、市场占有率提高的前提下进行的,假如一旦发生市场冲突就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并不是处处支持全球化的社会进程,例如在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个问题上,美国一直未能签署京都议定书。在许多全球性合作中,美国也是为了本国的狭隘利益而迟疑不决。美国至今以超级大国的身份处处奉行霸权主义政策,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反动力量。第二,全球化对西方强势狭隘民族主义的挑战日益增强。社会的全球化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平衡化、全面合作化、合作的有机化,这些特点坚决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以西方为中心的强权政治不利于全球社会的广泛合作,更不利于全球的一体化整合,在亚洲、南美洲、非洲国家逐渐崛起的时代,西方中心论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八国集团开始出现被20国集团取代的迹象,这是全球化合作对西方为中心突破。第三,全球文化的多样化要求各种文化之间的相容性,西方文化的普世性开始受到怀疑,其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受到尊重。

(下转5版)